

杨业新论

任崇岳

杨业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抗辽将领。千百年来,他的事迹流传遐迩,“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,皆能道之”^①。从宋元以来,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小说、戏剧,百花纷呈,争奇斗妍,仅据清代的《昭代箫韶》一书记载,有关杨家将的戏就有三百六十出之多。史学界对杨业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也不少。但除了考证文章和杨业的死因讨论稍多之外,全面评价杨业的文章尚不多见。现仅就管见所及,略陈俚见于后。

一、杨业的身世及其它

杨业在降宋前本名杨重贵,北汉开国皇帝刘崇改其名为刘继业,曾巩的《隆平集》又作杨邈、杨继邈。“继邈本名重贵,姓杨氏,重勋之兄,幼事北汉世祖(刘崇),遂更赐以今名”^②。太平兴国四年(979)宋太宗灭北汉,刘继业势穷力蹙来降,“上喜,慰抚之甚厚,复姓杨氏,止名业”^③。刘崇与宋太宗对杨业的姓名如此感兴趣,显然因为他是勇冠三军的骁将,因此借改名作为笼络的一种手段。

杨业的籍贯有河曲、太原、麟州(陕西神木县)三说。常征《杨家将史事考》判定杨业为山西河曲县人,但所引事实皆不足征信,故同意者寥寥。《宋史》本传、王称《东都事略》、《宋学士全集·杨氏家传》皆云为太原人,而《隆平集·杨邈传》、《宋朝事实类苑》、《欧阳文忠集·杨琪墓志铭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书则说是麟州人。由于杨琪是杨业的侄系,欧阳修写墓志铭绝不会弄错籍贯,因此麟州说可以凭信。余嘉锡先生的《杨家将故事考信录》、聂崇岐教授的《麟州杨氏遣闻六记》皆主此说。由于杨业的大部生涯都是在北汉度过的,他入宋后七年便殒命死节,因而《宋史》与《东都事略》说他是太原人,也并非凿空妄说。余嘉锡认为“崇(即刘崇)锡业姓名为刘继业,盖养为诸孙,由此移家太原,故《东都事略》及《宋史》,遂以业为并州太原人”^④。这个解释也可聊备一说。

关于杨业的年龄,诸书均未记载,因此只能根据有关史料作点管窥蠡测。聂崇岐说杨业生于唐同光二年(924),“则雍熙三年(986)应为三十六岁”^⑤。余嘉锡则说:“史不载业年寿,但言弱冠事刘崇,若如余所推测,事在汉隐帝以前崇未即位时,则至雍熙三年,已阅三十六载,业死时年当五十余”^⑥。一说六十三岁,一说五十余,二者大相径庭,其实都不精确。杨业于雍熙三年壮烈殉国,这一点已无疑问,须要考查的是他的生年。《长编》谓杨业“幼事北汉世祖”,幼到什么程度,无从捉摸。《隆平集·杨邈传》云“弱冠事太原刘崇,至节度使”。据此可以断定,他在二十岁左右始隶刘崇麾下。《旧五代史·刘崇传》云:“高祖(后汉高祖刘知远,刘崇为其族弟——笔者)镇并、汾,奏(刘崇)为河东步军

①《欧阳文忠集》卷29,《杨琪墓志铭》。

②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9,以下称《长编》。

③《长编》卷20。

④《余嘉锡论学杂著》下册第443页,中华书局1977年版。

⑤《宋史丛考》下册,页379,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
⑥《余嘉锡论学杂著》页462。

都指挥。逾年，授麟州刺史”。《旧五代史·汉高祖本纪》则说刘知远于晋天福六年（941）“七月授北京留守，河东节度使”。由此推测，刘崇当在天福七年（942）被刘知远授为麟州刺史，杨业皈依刘崇，大约也就在此时。倘此说不诬，由此上溯二十年，可知杨业当生于922年（后梁末帝龙德二年）。雍熙三年（986）七月，杨业兵败被俘于山西朔县之陈家谷口，旋即为国捐躯，终年应为65岁。

杨业究竟有儿子，诸书记载不同，但皆云陈家谷之役，其子延玉亦歿于阵。《长编》谓杨业歿后，太宗“录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”^①，加上延玉，共为六人。《宋史·杨业传》则云杨业及其子延玉牺牲后，尚有子延朗（即杨延昭）、延浦、延训、延环、延贵、延彬六人。太宗以业歿于王事，其子皆封赠了官职，看来七子之说较为可靠。但《宋史》并未标明他们弟兄七人的行第，只是说“业既歿，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仪副使，次子殿直延浦、延训并为供奉官，延环、延贵、延彬为殿直”^②。由于杨延昭在杨业北伐时曾任先锋官，因此首先提到了他，以下诸人既称为次子，说明杨延昭为其他诸人之兄。但《宋史》在叙述杨业战死时也说“其子延玉亦歿焉”，延玉、延昭孰为老大，孰为老二，使人无所适从，但他在亲弟兄七人中不排行老六，是可以肯定的。徐大焯《烬余录》则云，契丹“犯寰，业出战，死之，长子渊平随殉，次子延浦、三子延训，字供奉，四子延环、初名延朗、五子延贵，并官殿直，六子延昭，从征朔州功，加保州刺史。真宗时，与七子延彬，初名延嗣者，屡有功，并授团训使。”余嘉锡的《杨家将故事参考信录》在引了这一段文字后说：“所载诸子次第，乃颇有据。史称延浦为次子，则延玉必是长子，延昭为六朗，则其排行必第六，故其次序如此。民间之流传亦有不诬者，此类是也”^③。徐大焯把延朗、延昭说成是二人，延玉改为渊平，并未标明材料的来源，而以治学谨严著称的余嘉锡先生竟笃信不疑，殊使人不解。《隆平集》、《东都事略》、《长编》、《宋史》等书都说杨延昭被契丹人称为杨六朗，这大概是和其叔父杨重勋之子一起排行为六的缘故。

目前流行的小说、戏剧，都说杨延昭之子名宗保，宗保之子为文广，这与正史不同。《宋史》、《隆平集》等书只说延昭之子即是文广，没有杨宗保其人。《隆平集》又说“诏录其子传永、德政、文广有差”，表明杨文广是杨延昭的第三子。而明初人宋濂的《宋学士全集》卷10《杨氏家传》则说延朗（即延昭）之子名充广，充广之子名贵迁，贵迁有三子，曰光震、光荣、光明。光震有子五人，曰文广、文真、文锡、文贵、文宣。按此说文广为延昭的玄孙，当中错了好几代。宋濂写此文时，《隆平集》传世已久，《宋史》也已梓行，不知他何以未提此二书？既写家传，当有所本，现在已经弄不清楚，只好存疑了。但文广和其曾祖充广同用一“广”字，是不太可能的，宋濂必定把其中的一个弄错了。

据《长编》、《宋史》所说，杨业歿后，宋太宗赠他为太尉、大同军节度使；而欧阳修的《杨琪墓志铭》和宋濂的《杨氏家传》则说宋朝曾赠为太师中书令；余嘉锡又说，“观元人称为杨令公，则业必曾领节钺，以五代方镇，率兼中书令故也”。余说纯系推测，似未可为据；而欧阳修、宋濂所说，也未说明杨业是何时被封为太师中书令的，不能证明是当时所封。但后人既称他为老令公，则空谷来风，必有所自。我认为杨业中书令之衔并非当时所封，而是由于其子延昭、其孙文广屡建奇功，朝廷为奖掖他满门忠烈，才泽及枯骨，累至中书令的。

杨业之妻余太君不见于正史，但常征、余嘉锡、聂崇岐等人根据大量的地方志资料考

①《长编》卷21。

②《宋史》卷272《杨业传》。

③《余嘉锡论学杂著》第468页。

证，余太君即折太君，余、折一音之转，容易致误。她是府州（陕西府谷县）永安军节度使折德殷之女。《宋史》有折德殷传，但不载嫁女与杨业事，因而有的同志对此说表示怀疑，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赞成此说。《辞海·潘美条》云：“太宗雍熙三年（公元986年）攻辽，指挥失当，致名将杨业陷敌牺牲。旋以业妻折太君提出控诉，受降级处分”。这个说法大体合乎历史事实。

二、宋太宗为什么重用杨业

杨业于太平兴国四年（979）五十八岁时归宋，六十五岁时殒命沙场，为国捐躯，为时只七年之久。在这短暂的七年时间里，他威震边庭，屡败辽师，成为抗辽的擎天一柱，其业绩足以炳烺千秋，耿耿斗牛之间。现在需要探讨的是，应当如何评价杨业入宋前的历史？宋太宗为什么要重用杨业？

关于第一个问题，有两种意见：一种认为杨业抗宋是桀犬吠尧，各为其主，无须深责；另一种则认为北宋统一北汉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军事行动，杨业抗宋是很不光采的事。北宋从公元960年赵匡胤建国算起，一直到979年才数平北汉，差不多用了二十年时间，这意味着杨业进行二十年的抗宋战争，这是事实，用不着回护。由于宋朝进行的是兼并统一战争，并无是非可分，因而杨业进行二十年的抗宋战争，不为史学家重视；而他进行的抗辽战争，虽然只有七年，由于是反抗民族压迫、民族奴役的正义战争，因而被人称为“爱国民族英雄”^①。我们探讨杨业的抗宋战争，不在于论证这段历史是否光采，而是想说明宋太宗为什么那样赏识这个负隅顽抗的北汉大将，一定要把他罗致麾下？这就是我们所要论述的第二个问题。

宋太宗之所以要招降杨业，有两个原因。首先，他需要向杨业这样允文允武、智勇双全的大将来捍边御敌。宋太宗麾下的战将虽然不少，但多是赳赳武夫，临阵杀敌有余，运筹帷幄不足，能和杨业匹敌者甚少。其次，宋太宗最赏识的是杨业赤胆忠君的品质，杨业抗宋愈是激烈，他招降杨业的心情就愈是迫切。历史上有点作为的睿智明君，最喜欢那些在风云变幻之际守节不移的仁人志士，最鄙薄那些见风转舵，见利忘义的庸夫俗子。欧阳修痛诋五代时的冯道“可谓无廉耻者矣”^②，司马光说冯道“乃奸臣之尤”^③，不过是因为冯道曾事五朝八姓，大节有亏；元世祖忽必烈在下令杀掉文天祥后，还不无惋惜地说：“好男子，不为吾用，杀之诚可惜也”^④，也是尊敬文天祥威武不能屈、富贵不能淫的高风亮节；赵匡胤的大将荆罕儒在进攻北汉时牺牲，北汉主刘钧“素畏罕儒之勇，常欲生致，及闻其死，求杀罕儒者戮之”^⑤。历史有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。宋太宗是历史上留正经史、熟悉掌故的帝王，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文苑英华》等书就是在他提议下编成的，他每日“阅御览三卷，因事有阙，暇日追补之，尝曰：开卷有益，朕不以为劳也”^⑥。多读书则见识广，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的嘉言懿行，他必定是稔熟的，因此对人材问题有着不同流俗的见解。如赵普死后，他亲撰神道碑，悲恸地说：“天不赦遗，予何自律，乃迹其景行，勒之鼎彝，昭臣范于将来，庶令名之不朽”^⑦。钱若水为同州推官时，办事干练，远近翕然称之，

①顾全芳：《谈北宋杨家将的爱国主义精神》，《光明日报》1984年8月1日。

②《新五代史》卷54：《杂传叙》。

③《资治通鉴》卷291：《后周纪二》。

④《续资治通鉴》卷186：《元纪四》。

⑤《宋史》卷272：《荆罕儒传》。

⑥王辟之：《渑水燕谈录》卷6：《文儒》。

⑦李攸：《宋朝事实》卷3：《御制》。

宋太宗听说后，“骤加晋擢，自幕职，半岁中为知制诰，二年中，为枢密副使”^①。他得到寇准，高兴地说：“朕得寇准，犹唐文皇之得魏郑公也”^②，把寇准比作魏征。这些，都反映出了宋太宗求贤若渴的心情。在宋兵围太原时，北汉宰相郭无为几次劝刘继元投降，不久被杀；已经致仕的左仆射马峰，“以病卧家，异入见北汉主，流涕以兴亡喻之，北汉主乃夜漏上十刻，遣客省使李勋上表纳款”^③。但宋太宗在灭北汉后，从未提及过郭无为，也没有褒扬过马峰，显然是鄙薄他们的为人。而对杨业则不同。据《长编》和《宋史》统计，杨业与宋兵进行过九次大的战斗，是北汉将领中抵抗得最激烈的一个。甚至在刘继元投降后，“业犹据城苦战”，他对北汉政权可谓披肝沥胆，一片惘诚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宋太宗才不惜一切，必“欲生致之，令中使谕继元，俾招继业。继元遣所亲信往，继业乃北面再拜，大恸，释甲来见。上喜、抚慰之甚厚，复姓杨氏，止名业，寻授左领军卫大将军。丁巳，以业为郑州防御使”^④。仅仅过了三个月，他便因“老于边事，洞晓敌情”，被任命为“知代州兼三交（太原城北五里古城村）驻泊兵马部署，上密封囊装，赐予甚厚”^⑤。杨业从此才开始了他真正的抗辽生涯。太平兴国五年（980）12月，他又被擢升为云州（大同）观察使，仍遥领郑州防御使，知代州事。“主将戍边者多嫉之，或潜上谤书，斥言其短，上皆不问，封其奏以付业”^⑥。宋太宗一生的活动应当如何评价容当别论，但他在坦然不疑地任用降将，始终如一地信赖杨业这一点上，可谓知人善任，慧眼独具。杨业必定因此而受了感动，才临难不苟，以死来报答他的知遇之隆。一个吐哺握发，一个见危授命，这在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史上，的确是一段不可多得的佳话。

三、叱咤风云的抗辽名将

以现在的观点看，契丹族是我国境内已经消亡了的少数民族，他们牧马南下并非异族入侵，但他们进行的是不正义的掠夺战争，因而遭到了中原地区汉族人民理所当然的抵抗。从后梁以来，契丹奴隶主贵族就频频南下，杀无辜，劫财物，致使中原地区庐舍荡为丘墟，良田鞠为茂草。尤其是公元947年1月辽太宗耶律德光颠覆后晋，进入大梁（开封）后，“乃纵胡骑四出，以牧马为名，分番剽掠，谓之‘打草谷’。丁壮毙于锋刃，老弱委于沟壑。自东西两畿（大梁、洛阳）及郑、滑、曹、濮，数百里间，财蓄殆尽”。同年4月，耶律德光在北上返国途中攻破相州（安阳），“悉杀城中男子，驱其妇女而北，胡人掷婴孩于空中，举刃接之以为乐”^⑦。迨至宋代，此风相沿不改，且寝寝有加剧之势。因此杨业的抗辽活动不只是为了保卫北宋的疆土不被侵犯，而是为了中原地区人民的生命不被屠戮，财产不被劫掠，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、文化不受到摧残和蹂躏。从客观上说，杨业的抗辽活动也符合契丹族人民的长远利益。既然这种抵抗已突破民族的局限，升华到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高度，说杨业是古代的爱国主义者，大概是不会有溢美之嫌的。

杨业在抗辽战场上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。太平兴国五年（980）3月，契丹大军十万寇雁门，他临危不惧，仅“领麾下数百骑自西径出，至雁门北口，南向击之，契丹兵大败，杀其驸马侍中萧咄李”。他以数百骑便大破了辽师十万，因而威震塞外，“时以业善

①②司马光：《涑水记闻》卷2。

③彭百川：《太平治迹统类》卷2。

④《长编》卷21。

④⑤《长编》卷20。

⑦《资治通鉴》卷286：《后汉纪一》。

战，号杨无敌”^①。“业自雁门之捷，契丹畏之，每望见业旗即引去”^②。此说容或有夸张之处，但契丹对杨业的敬畏，于此可见一斑。在他七年的抵抗生涯中，必定打过不少胜仗，才使得契丹望而生畏，可惜史籍阙如，我们已无从得知了。

雍熙三年（986）的北伐之役，对于宋朝来说，完全是一次毫无胜利希望的冒险行动。由于宋朝，准备并不充分，宋太宗事事掣肘等原因，作为西路军统帅潘美副手的杨业，虽然斩将夺旗，迭挫强敌，但已无法扭转败局，再加上潘美、王侁等人指挥失误，遂使一代抗辽名将兵败被俘，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。由于杨业是抗辽的干城，因而他的牺牲，也就给宋朝带来了严重后果。在他临敌身亡四个月之后，辽兵攻占瀛州（河北河间），宋朝大将刘廷让全军覆没，他本人仅以身免；接着平州团练使贺令图、高阳关（河北高阳东）部署杨重进又殒命沙场。“士卒前后死者数万人，沿边诸郡创痍之卒不满万计，皆无斗志，河朔震恐。悉科乡民为兵以守城，皆白徒，未尝习战斗，但坚壁自固，不敢御敌，虜势益振。长驱而入，连陷深（河北深县）、祁（河北安国）、德（山东德州）等数州，杀官吏，俘虏士民，所过郡县，坚壁不下者，悉俘取。料村中士女，大掠纵火，所在辇金帛而去，魏（河北大名）博（山东聊城）之北，民甚苦焉”^③。自是之后，宋兵一蹶不振，辽兵则频频南寇，如入无人之境，这种局面愈演愈烈，终至酿成了景德元年（1004）的澶渊之战。如果杨业没有受到权贵们的妒忌和排挤，如果宋太宗、潘美等人的军事指挥不致失误，凭着杨业的才干和声望，本来是可以卓有成效地阻挡住辽军的入寇的，但这一切都随着杨业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。

杨业的声望之隆，我们可以从辽方的记载上得到印证。《辽史》于杨业被俘之后，大书特书，从本纪到有关诸将的传记不厌其烦地一再描述，于其他死节宋将或轻描淡写，或略而不书，正反映了辽方朝野因杨业被俘而按捺不住的得意心情。《辽史》卷11《圣宗本纪》云：

（统和四年）秋七月丙子，枢密使斜轸遣侍御涅里底，干勤哥奏复朔州，擒宋将杨继业，及上所获将校印绶、诰敕……辛卯，斜轸奏：大军至蔚州，营于州左。得谍报，敌兵且至，乃设伏以待。敌至，纵兵逆击，追奔逐北，至飞狐口。遂乘胜鼓行而西，入寰州，杀守城吏卒千余人。宋将杨继业初以骁勇自负，号杨无敌，北据云、朔数州。至是，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，至狼牙村，恶其名，不进，左右固请，乃行。遇斜轸，伏四起，中流矢，堕马被擒。疮发不食，三日死。遂函其首以献。诏详稳稽敷食传其首于越休哥，以示诸军，仍以朔州之捷宣谕南京、平州将吏。自是宋守云、应诸州者，皆弃城遁。

杨业不过是北伐三路军中的偏师西路军的副统帅，辽方竟然在本纪中写他的骁勇以及他行至狼牙村时的矛盾心情，在他死后又是传首辽方军队，又是以朔州之捷宣谕辽方将吏，而对职位比杨业高得多的曹彬、潘美诸人则惜墨如金，没有这样绘声绘色的描述。《辽史》卷83《耶律斜轸传》、《耶律奚低传》，卷85《萧挈凛传》、《耶律题子传》、《耶律诸理传》、《耶律奴瓜传》中亦有详细记载。这种不寻常的做法表明，辽方是把杨业当做主要对手的，只要擒获杨业，就可先声夺人，稳操胜券。宋军主帅曹彬在辽方眼里不过是才干平庸的将领，至于其他宋将则自郅而下，更毋须提及了。

自然，最能表明辽方对杨业敬慕的，还是古北口（今北京是密云县境）的杨业庙。这个庙建于何时虽不可考，但此地久已属辽，当系辽国所修。宋仁宗时的刘敞、神宗时的苏颂、哲宗时的苏辙等人奉使契丹路过古北口时，都曾凭吊过杨业庙并有诗篇传世。刘敞《公是

^①《宋史纪事本末》卷13：《契丹和战》。

^②《长编》卷21。

^③《宋会要辑稿》卷5257：《蕃夷一》。

集》卷28《杨无敌庙》诗云：“西流不返日滔滔，陇上犹歌七尺刀，恸哭应知贾谊意，世人生死等鸿毛”。苏颂《魏公集》卷13《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》诗云：“汉家飞将领熊黑，死战燕山护我师，威信仇方名不灭，至今遗俗奉遗祠”。苏辙《栾城集》卷16《奉使契丹二十八首》云：“行祠寂寞寄关门，野草犹如避血痕。一败可怜非战罪，大刚嗟独畏人言。驰驱本为中原用，尝享能令异域尊。我欲比君周子隐，诛彤聊足慰忠魂”。诗中一片惋惜之情，可谓溢于言表。从文学角度看，这些诗虽然算不得上乘之作，但如从史学角度看，由于他们是把所见所闻写入诗篇的，因而其史料价值决不在其它史籍之下。不过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。杨业牺牲于山西朔县，何以庙却建在北京市密云县之古北口？顾炎武曾批评《大明一统志》说：“一统志，杨令公祠在密云县古北口，祀宋杨业。……业生平未尝至燕，况古北口又在燕东北二百余里，地属契丹久矣，业安得而至此！且史明言雁门之北口，而以为密云之古北口，是作志者东西尚不辨，何论史传哉”^①！顾氏此说只是否认密云县古北口杨业庙的真实性，尚未怀疑杨业为国捐躯的气节。有的同志则推断说，由于杨业已经向辽乞降，辽方为表彰自己的降臣，因此才将庙建于密云县之古北口，而不是山西朔县之北口。其文云：“在苏辙奉使北上途中，距朔州战场颇远。其史料价值并非‘不在其它史籍之下’，而是远在其他史籍之下。宋人表彰自己的忠臣，辽人表彰自己的降臣，均是各有所需，不为可怪的”^②。这一论点新则新矣，奈经不起推敲何！且不说杨业乞降一说是子虚乌有，即使真有乞降之事，《辽史》也说他被俘后三日不食，加上箭伤严重，终致殒命，他一天也没有为辽方效过力，辽方便为之立庙祭祀，这难道是可能的吗？辽方有那么多谋臣武将如耶律隆运、耶律斜轸等人，为什么弃而不顾，偏要为这位降将军立庙？是因为他投降有方？或是气节可风？还有，既是宋方的忠臣，怎么又是辽方的降臣？敌对的双方怎么会同时表彰同一个人物？这些疑窦都不是主张投降说者所能解释清楚的。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杨业为国尽节，殒身不恤，因而宋辽双方都认为有必要激励自己的臣子象杨业那样鞠躬尽瘁，公忠体国。因辽宋方又是处分潘美、王侁等人，又是封杨业的儿子为官，辽方则在自己境内为杨业立庙。宋太宗和辽圣宗均非昏君，在这一点上倒是灵犀相通的。

行文至此，似乎还未解释清楚为什么杨业的庙宇不立在他殒身之地的山西朔县，而立在了密云县的古北口？余嘉锡说：“吾尝综合诸书而观之，业但战败于陈家谷，非死于陈家谷也。辽人曾下令军中，必欲生擒继业，盖爱其忠勇，欲俟其屈服而后重用之，如后来康保裔王继忠之比。既已阵擒其人，自必遣兵押送，致之燕京，使面其虜主。业求死不得，乃绝食自戕，经三日之饿，遂死于古北口耳。”这种推论虽能自圆其说，但仍给人以附会之嫌。厉鹗《辽史拾遗》卷14云，刘敞、苏辙的诗是在奉使时作的，“则祠物自辽日可知，无敌忠义感动敌境，又何论古北口之非陈家谷也。”这才算道出之事情的真谛。

自然，人们之所以怀念杨业，不仅因为他是声誉卓著的抗辽名将，还因为他是刚介耿直的官吏。“邟勇而有谋，与下同甘苦。仕北苦寒，未尝独设炭。为政简易，郡民爱之，天下闻其死，皆为之愤叹”^③了。武将而兼循吏，公忠体国而又驭下有方，无论从哪方面说，杨业都是封建社会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。

①《京东考古录·辨〈一统志〉杨令公祠之误》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。

②降大任：《再谈杨业晚节的疑点》，《山西大学学报》1983年4期增刊号。

③《隆平集》卷17，《杨邠传》。